



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 理论与实践研究

艾四林／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创新研究”资助
北京市委教工委设“艾四林工作室”研究成果

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 理论与实践研究

艾四林／主 编
于 昆 李全喜 秦彪生／副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艾四林

主编.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034-7856-7

I . ①新… II . ①艾… III . ①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
—研究 IV . ①D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307607号

责任编辑：程 凤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11.75

字 数：180千字

版 次：2016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8.00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形成的历史根据.....	1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	10
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实践要求.....	15
论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及内涵.....	23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治国理政之四维.....	32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中国梦.....	42
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保证.....	49
论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思想建设的关系.....	59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三重路径.....	66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促进社区党组织作风转变初探.....	73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新特点.....	80
公安廉政建设的政治伦理向度研究.....	87
非公企业基层党建与企业治理	
—基于湖北省的调查分析.....	94
全面从严治党视角下九三学社自身建设及参政议政调查分析	
—以山东省泰安市为例.....	102
新媒体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宣传教育的思考.....	113
全面从严治党视角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教育方式探索.....	119
全面从严治党视角下高校学生党员的政治信仰教育.....	125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133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融入大学生日常生活研究	140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思考	146
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法	155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融入公安院校思政课的教学方法	162
思想上从严治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	168
列宁《怎么办？》的党建思想及当代启示	177
后记	184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形成的历史根据

邹秀春 李 阳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全面推进从严治党”^[1]的战略部署。“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保证。“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植于中国共产党90多年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党根据不同时期的要求，始终坚持“从严治党”，并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就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形成的历史根据。

一、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从严治党”思想

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标志着工人运动由自发阶段进入自觉阶段，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篇章。工人阶级需要用新的思想武器重新审视中国的一切问题，逐渐产生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意愿，也有建立新型政党的迫切要求。中国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亡国灭种的关键时刻，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一方面，先进知识分子代表工人阶级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发挥自己的优势，向工人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1921年3月，李大钊在《曙光》上发表的《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公开呼吁，中国共产主义者应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党。

[1] 习近平：《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 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

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积极筹备和努力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纲领中包含了属于党章性质的一些条文，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可以说，自中国共产党诞生那一天起，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就被确定下来。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章程，即《中国共产党章程》。这部章程第一次详尽地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也都做了具体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正式章程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的完成。应当说，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民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严治党”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

（一）着重思想建党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同时，十分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开创了中国特色的党建之路。

20世纪20年代初，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成分中农民占了较大比例，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党内存在小农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党员成分既定、短期内又无法改变的不利条件下，开始进行思想建党工作。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就是确立思想建党的根本标志。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所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重要决议。这一决议提出了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实事求是解决党所面临的革命问题”^[1]。以积极的思想斗争和对错误倾向的批判，取得党的健康发展，是党的思想建设的一大利器。

（二）严格遵照党员标准

为了配合当时的斗争形势，《古田会议决议》强调了党组织在发展党员问题上要严格把关，确保党员的质量；对于党员中存在的不良习气和行为，如政治观念错误、吸食鸦片、赌博等，且屡教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毛泽东指出，“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和旧思想坚决地分清界限，严肃地、但又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们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图以他们的本来面貌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1]。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看来，党的组织要保持纯洁性和先进性，一是对加入党组织的积极分子的考察要从严，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常抓不懈，以此促进党的健康发展。

（三）坚决惩治腐败

早在“苏维埃红色政权”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注意反腐问题，探索解决党政人员的不良风气和不良行为问题。1926年中共中央发布《坚决清理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次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中，增加了“监察委员会”一章，对监察机构的设置和纪律处分都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开展了历时两年的惩腐肃贪运动，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运动。1933年，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区一级党委设立监察委员会。1948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在《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中申明，建立行政监察机关——人民监察委员会。可见，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非常重视从严治党问题，探讨并制定了相应的党纪，以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

在随后的实践中，“从严治党”思想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这段告诫可以说是对全党干部的警世箴言，堪称反腐倡廉的经典之语。

（四）适时开展整风运动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暂缓了对中国大陆的狂轰滥炸，中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国共产党得以休整，开启了党的历史上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整风运动。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标志着整风运动的开始。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使干部在思想上得到提升，党员素质得到提高，党风得到了根本性好转，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从严治党”思想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为了配合政治、经济发展的形势需要，从严治党思想也有新的实践要求。

（一）集中开展运动式反腐

1951年，鉴于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现实，毛泽东强调，“必须严重注意到党的干部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1]，提出只有“惩办”^[2]。

19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批判官僚主义、直击党内腐败，指出，“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3]这些都危及着党和国家的前途。为此，加强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高党员的素质，倡导党的干部不要脱离群众，坚决反对党内腐败，严惩腐败分子。邓小平在报告中对执政党现状的忧虑，与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所敲响的警钟，两者的精神实质一脉相承。

（二）整党整风、从严治党

1957年4月27日，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整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党内新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开展整风运动，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清除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需要。不幸的是，整风运动

[1] 刘金田主编：《清廉领袖毛泽东》，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页。

[2] 刘金田主编：《清廉领袖毛泽东》，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7页。

后来脱离了它的初衷，“左”倾思潮逐渐主导了运动的发展方向，使其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演化为“反右”斗争并化扩大，酿成历史悲剧。但如果我们仅仅从党建的角度看，以整党整风的方式从严治党，不失为一条重要的路径。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从严治党”思想

1978年底，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也拉开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帷幕。改革开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如“一切向钱看”的陈腐风气以及极端享乐主义、官场陋习造成的干部特殊化、追名逐利引发的道德失衡和信仰缺失等问题。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着力从严治党。

（一）邓小平的从严治党思想

1979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对改革开放中坚持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做了充分的阐释，提出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整顿党的作风。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党风遭到污染的现实，在1986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痛切地指出，“有些党员干部的作风和社会风气实在太坏了，在整顿作风中确实有些人要开除党籍，要清理一下。”^[1]

邓小平坚决主张对腐败党员干部严厉打击，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邓小平还告诫全党同志，一定要克服过分容忍、畏难手软和息事宁人的情绪，否则保护的是坏人，损害的是党和人民的事业。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经济犯罪”的新特点，大案增多，性质更加恶劣。对此，邓小平于1989年提出了两大任务，“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2]。邓小平针对党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发展现状，尖锐地告诫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3]。为此，“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4]。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现在广大群众议论多、意见大的是少数党员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页。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特别是某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损害群众利益，干扰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败坏党的声誉。这是特别需要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的严重问题。报告通过总结党的建设经验，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党内腐败的态度和政治腐败的决心，“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党内反对腐败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容忍腐败分子留在党内，就会使整个党衰败”，“经验证明，仅仅靠教育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对于那些败坏党和人民事业的腐败分子，必须采取坚决清除的方针，一经发现立即处理，有多少清除多少，决不能姑息养奸”，“必须从严治党，严肃党的纪律”^[1]。此后，“从严治党”作为党建领域的一个高频词语，正式出现在党的文献和党的建设实践中。

在贯彻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好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传统教育，坚持从制度上保障从严治党，坚持来自党的监督、群众的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等。可以说，“从严治党”思想是邓小平思考的治党方针，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着日后历届党的领导集体的从严治党实践，“从严治党”的内涵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拓展。

（二）江泽民的从严治党思想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提出了“面向新世纪的共产党”的科学命题，继承了邓小平从严治党的思想，丰富了其理论内容。

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上作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在党的建设问题上再次重申了惩治腐败的决心，“腐败分子危害党和人民，不论是什么人，都必须依照党纪国法，坚决予以惩处”^[2]。党的十四大通过的修改的党章强调，“必须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从严治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提高党的战斗力，把党的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3]。这是首次把“坚持从严治党”写入党章，在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

[2]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4页。

党的根本法规上肯定了从严治党方针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中特别阐述了从严治党理论，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命题。“党要管党”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道路上走向成熟，“从严治党”表明了党自我管理的决心和信心。以党要管党为基础的从严治党，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从严治党的基本路径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宏观视阈的执政党管理，即党要管党。另一个是党员的自我管理，即“严格自律”的自我修养和自我纠正。江泽民在2005年“七一”讲话中再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始终注意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从1992年到2002年的十年期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从严治党的理论与实践，始终坚持反腐倡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逐步形成了六条从严治党的基本原则，即从严治党为经济建设服务、从领导干部做起、严格依法办案、不搞群众运动和人人过关、惩治腐败与扶持正气相结合。这些原则的提出，不仅丰富了从严治党理论，也使实践中可操作更大，指导性更强。

（三）胡锦涛的从严治党思想

自党的十六大开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致力于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并把这一理论和实践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胡锦涛曾强调，“要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适应时代发展和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以提高执政能力为重点，持之以恒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的各方面建设成效最终都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党的执政使命上来”^[1]。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视角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以从严治党为立足点推进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的路径，提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

[1]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腐败体系，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总体思路。与此同时，还设计了反腐倡廉的规定和法纪，提出认真贯彻党内监督条例，进一步加强党内监督；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加强和改进对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述职述廉制度、民主评议制度、谈话诫勉制度和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依法实行质询制、问责制、罢免制。通过这些具体的体制和机制的设定，从严治党才真正能够落实到实践中。

2005年1月，胡锦涛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作了重要报告，首次提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命题。在庆祝建党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明确地提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保证党始终具有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的讲话中，胡锦涛再次强调，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以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重点是推动“五个建设”，即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2012年11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党面临“四大考验”，存在“四种危险”，再次强调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重申了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全面加强“五个建设”，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保持党员的先进性不仅靠教育和引导，更重要的是还要依赖对党员的从严管理。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把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下去。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管党和治党问题上，开始着眼于制度和法规的构建，切实做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把行之有效的方式，上升为党规和法纪的高度，使操作有更好的切入点，把从严治党理论与实践推向更高阶段。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理论基础，始终坚持党的先进性，保持党的纯洁性。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党的建设，

致力于从严治党，为搞好党的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不断增添新内容。这些都成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历史根据。

（邹秀春，北京体育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副教授。李阳，北京体育大学2015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读研究生）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

王蓉霞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方略愈益清晰，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2014年11月，习近平到福建调研考察时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三个全面建设目标，12月到江苏调研时，又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由此构成“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其中，全面从严治党是战略布局中的核心举措。应当说，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弘扬，也是在现代化建设新形势下的现实选择。

一、全面从严治党是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需要

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许多诱惑，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坚定的信仰始终是党员、干部站稳政治立场、抵御各种诱惑的决定性因素”，^[1]也是党解决社会问题的决定性因素。一个有理想信念的党，才会有力量，才能不断克服发展过程中的困难障碍，最终取得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带领全国人民克服了后发展国家现代化遇到的障碍，建立起相对齐全的工业化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但由于这一时期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遭到严重的挫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

[1] 《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页。

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进行现代化建设，使我国在短短的 30 多年时间里，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老百姓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然而在对物质生活富足的追求中，一些人的物质享乐、金钱崇拜、商品崇拜、享乐主义抬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转型，面临的国内外矛盾异常复杂，如果没有理想支撑，整个民族的崛起与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理想信念决定事业成败。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1]针对当前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淡薄的现实，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提出必将有助于克服党员干部的消极思想，再塑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铸造坚强的领导核心，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前进。

二、全面从严治党是多样化社会思潮中凝聚最大思想共识的需要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以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已从单一的社会结构走向多元化格局，人们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思维习惯、心态等都呈现出多元化格局。

多元化的社会结构是中国社会充满活力的表现，但是伴随社会转型的加速，还有不少严峻问题。比如，发展不均衡、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少数党员干部存在理想信念动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如何解决，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多样化社会思潮。据《人民论坛》做的关于社会思潮的跟踪调查显示，2014 年在中国值得关注的有十大思潮：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民粹主义、普世价值论、生态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主义、新儒家、宪政思潮，此外，

[1] 《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31 页。

还有其他“六大思潮”和“七大社会思潮”之说。这些表明，社会思潮在我国已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社会思潮是一个社会意识形态状况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它们正是多元化利益群体利益诉求的思想反映和表达。

思潮丛生的现状深度考验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社会思潮多元化的背后，是当下各种社会问题的反映。在社会转型和利益格局调整的情况下，思潮的多元化趋势不会停止。中国共产党只有在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广泛争鸣中凝聚最大思想共识，才能顺利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能否成功引领社会思潮，保持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已然成为历史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艰巨任务。

从总体上讲，目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主流是健康向上的，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但要使马克思主义发挥其根本性的指导作用，还需要继续加强各级党委的影响力。全面从严治党为在多样化社会思潮中凝聚最大共识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和理论保证。从严治党将使“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得到加强，党可以通过发挥政治优势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引导和管理，并不断提升正确引导社会思潮能力和水平，真正发挥凝心聚力、整合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核心作用；全体党员理论水平的提高，也可以增强党员在凝聚最大共识方面的吸引力，“无数事实证明，对共产党人来说，只有理论上清醒才能有政治上清醒，只有理论上坚定才能有政治上坚定”^[1]。

三、全面从严治党是在改革发展关键期动员群众的需要

改革开放 30 多年，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一定的距离，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更是任重而道远。如何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共同建设国家，党在其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首次与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特别强调指出，“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但我们自豪而不自满，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全党必须警醒起来。

[1] 《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37 页。